

谈谈唐代的秘书省

赵 永 东

一、机构沿革

秘书省是主持国家图书事业的中央行政机构，也是保存和整理国家藏书的主要场所。

唐代秘书省沿用隋制，但组织系统更臻完善。除了盛唐时期以庋藏图书为重要职能的集贤殿书院之外，在唐前期和唐后期的国家图书事业中，秘书省还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

唐代两都均设有秘书省。设于西京长安皇城内的秘书省，其旧址即为原隋朝秘书省。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唐军攻克长安的同时，李渊即“命主符郎宋公弼收图籍”^①。在接管的这部分图籍中，除了隋朝政府的档案文书外，还包括嘉则殿重复相糅的图书八万卷。唐初建秘书省，任夏侯端为秘书监，魏征为秘书丞。武德四年（621年）秦王李世民在平定东都洛阳的王世充时，“得隋旧书八千余卷”^②，翌年“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不幸“行经底柱^③，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④。隋朝留下的这份八万余卷的图书遗产（其中半数左右是复本），构成了李唐王朝秘书省的可观家底。

东都洛阳在王世充被平定后，曾一度废为洛州总管府。后几经改称，至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复置为东都，渐加修葺。武

后临朝称制，又改东都为神都，更事营构，“宫室百司市里郭郭于是备矣”^⑤。东都秘书省大概就是在显庆以后设立的。

西京秘书省前有监院厅事，为公务之所；监院东有书阁，重复以贮古今图籍；东面尚有校书院；省后有堂，虞世南仕隋为秘书郎时，曾于此撰就《北堂书钞》行世。除典藏经籍图书、书画珍品外，东都秘书省著作院内还保藏有东汉蔡邕所书熹平石经及魏正始石经数十段。这些石经残片为兵燹劫余，几经迁徙，至贞观四年（630年），秘书监魏征方将其从原隋将作内坊迁置西京秘书内省。东都秘书省建立后，武则天遂将这些石经残片迁移到了洛阳。

唐初秘书省有内外之别。秘书内省之名起于隋，在隋为秘书内外三阁之一，兼具庋藏、校理和著述的职能。而唐代秘书内省只是临时修史场所。唐初因隋旧制，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掌修国史。贞观三年，太宗复敕编修列代史，秘书监魏征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其事，因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与宫城外的秘书本省相对。敬播就曾于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于禁中置史馆，以他官兼领，宰相监修。从此秘书省著作局始罢史职，秘书内省也随之而废。

秘书外省即秘书省本府，因其设置在宫城之外，故名。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置国子、太学、四门学，取文武官七品至三品以上子孙为学生；郡县学亦各置生员。至十一月，则于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秘书省的“小学”罢于何时，史料无征，大概在弘文馆设立之后。

高宗、武后时期，曾大改百司及官名，秘书省亦在所难免。高宗龙朔二年（662年）二月，秘书省改称兰台，其职官秘书监改称兰台太史，秘书少监改称兰台侍郎，秘书丞改称兰台大夫，秘书郎改称兰台郎。咸亨元年（670年）十月，恢复原名。武后垂拱元年（685年）二月，又称秘书省为麟台，秘书监为麟台监，

秘书少监为麟台少监，秘书郎为麟台郎。至中宗神 龙元 年（705 年）二月，又改复原名。

唐代中叶以前，秘书省尚附设二局，即著作局和太史局。

唐初著作局继承了魏晋以来的传统，是掌修国史的机构。贞观三年禁中新设史馆后，著作局始罢史职，只剩下“修撰碑志、祝文、祭文”^⑥之任了。著作局有著作郎二人（从五品上），著作佐郎四人（开元二十六年减二人，从六品上），掌制碑颂之属，分判局事；校书郎二人（开元二十六年减一人。正九品上），正字二人（后减一人。正九品下），“掌仇校书籍，若本局无书，兼校本省”^⑦；楷书手五人，书令史一人，书吏二人，掌固四人，等等。高宗龙朔二年，曾改著作局为司文局，著作郎为司文郎中，佐郎为司文郎，咸亨元年均恢复原名。

太史局是掌天文、历书、计时的机构。西京太史局位于皇城承天门街之西第六横街之北，与秘书省相距二、三百米；东都太史局则更在皇城以外。唐初定制太史局隶于秘书省下，全在于其职责与国史的撰修密切相关。当著作局罢去史任后，太史局与秘书省的上下隶属关系便徒有其表。其后几经分合，太史局之名也屡屡变更，直至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十月更名为太史监，才彻底从秘书省独立出来。

二、图书度藏

唐代秘书省图书，按经典四分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库度藏，标以甲、乙、丙、丁之名。“凡四部之书，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贮本，以供进内及赐人。凡敕赐人书，秘书无本，皆别写给之。”^⑧其“正本”专供“御览”，书缝并盖有小印。其“副本”则主要用来赐人。秘书省图书在性质上属于“御书”，因此向臣下或宗室颁赐图书，自来被视为一种“殊荣”。如贞观时凉州都督李大亮以惠政闻，被太宗褒为“立志方直，竭节至

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因而得赐荀悦《汉纪》一部。同时，唐朝在与睦邻交往中，出于亲善或“陶一声教”的目的，也往往采取赐书的方式，如太宗、武后赐书新罗，玄宗令秘书省写《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予吐蕃等，便是如此。除赐人外，副本似尚可“供诸司及官人等”借阅，贞观末李敬玄借读御书、武后时李邕入秘阁读书、文宗时段成式披阅秘书等，利用的本子即当为副本。其“贮本”，顾名思义，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库本。盛唐时期的韦述在《两京杂记》中曾记载说：“秘阁图书，皆表以牙签，覆以锦帕。”^⑨表明唐时的书籍制度仍为传统的卷轴形式。

前已述及，唐朝秘书省的最初家底，便是承隋而来的八万余卷的图书遗产。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秘书丞令狐德棻因时承丧乱之余，经籍亡散，秘书湮缺，奏请购募遗书，并增置楷书手，专令缮写。史称“数年间，群书略备”^⑩。但令狐德棻只是做了藏书补充工作，而未对之进行整理。直至贞观三年（629年），秘书监魏征始“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⑪。这是唐政府对国家藏书进行的首次全面校理。在其后不久官修的《隋书·经籍志》中，著录了至唐初尚存的历代图书共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其中经部十类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史部十三类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子部十四类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集部三类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另有道经四类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佛经十一类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这个数字虽非其时秘书省藏书总数，但相去不会太远。高宗时除继续建设“内库”外，尚因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兰台太史武敏之、兰台侍郎李怀俨等，鸠集儒学之士，于兰台刊正然后缮写。武后当政之初，曾立有较为严格的两京四库书典守之则：“文明元年（684年）十

月敕：两京四库书，每年正月据旧书闻奏。每三年，比部勾覆具官典。及摄官替代之日，据数交领，如有欠少，即征后人。”^⑫但武则天长驻洛阳，继后的唐中宗更是宫禁不严，因此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国家藏书亦多有散落。虽然中宗景龙三年（709）六月，曾“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⑬，但因宫廷内乱不休，管理松弛，至开元初，“秘书省典籍散落，条流无叙”^⑭，“文籍盈漫，皆良朽蟬断，签牒纷舛”^⑮。于是开元五年，玄宗侍读马怀素上疏奏引尹知章、韦述、毋煚等二十多位学者入秘书省整理编目，马怀素以秘书监领衔主持。怀素卒后，玄宗又令名儒元行冲继领。至开元八年春，草编成二百卷的《群书四录》。据《唐会要·修撰》记载，这部煌煌巨制共著录了秘书省藏书凡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但由于此目书成草率，未遑精悉，实际上是一部未圆满完成的国家目录，因此其所著录的数字与实际情形并不完全相符。这部目录的主要编修者之一的毋煚当时即曾自言“常有遗恨，窃思追雪。乃与类同契，积思潜心，审正旧疑，详开新制”^⑯，而在《群书四录》的基础之上撰成四十卷的《古今书录》。据《旧唐书·经籍志序》引毋煚《古今书录序》所载，《古今书录》共著录秘书省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其中经部十二类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史部十三类八百四十部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子部十七类七百五十三部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集部三类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零二十八卷；毋煚另撰有《开元内外经录》，著录佛经、道经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较之贞观间藏书数，总的说还是有所发展的，但与同期集贤殿书院八万余卷的藏书数相较，却难以比肩了。这时的集贤院是首屈一指的图书典藏和整理机构，是当时学术文化的中心。由于集贤院在盛唐时期的崛起，秘书省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安史乱起，集贤院摧毁几尽，秘书省亦同样不能避免兵火

的洗劫，史称“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①⑦}。战乱结束后，秘书省频频发使求书，并广开献书之路，或重金购赏，或超授官资，为重建国家藏书进行了一定努力。但在国运日蹙的景况下，连逢乱祸，再也未能恢复到象开元时期集贤院八万卷藏书那样繁盛的局面。文宗大和四年（830年）曾达到六万余卷，甘露之变后，尚余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其后甚至还一度达到了“七万余卷”，但随即在黄巢起义的战火中几乎倾数化为灰烬。更事搜募之后，仅得一、二万卷，以至昭宗时被“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人占住”，经秘书省奏请，方复还其书，迁出乐人，旋又随着昭宗的徙洛而几乎丧失殆尽^⑧。

注：①《新唐书·高祖纪》。

②①⑦《新唐书·艺文志序》。

③底柱，或称“砥柱”，即三门山，指原柱立于三门峡河心的人门、神门、鬼门河漕旁的三座石岛。

④《隋书·经籍志序》

⑤《唐六典·工部》。

⑥⑧《唐六典·秘书省》。

⑦《通典·职官典八·秘书监》。

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十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注引。

⑩《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⑪《旧唐书·魏征传》。但本传及《唐会要·经籍》皆作二年，误，因魏征贞观三年二月始为秘书监。

⑫⑬《唐会要·经籍》。

⑭《旧唐书·马怀素传》。

⑮《新唐书·马怀素传》。

⑯《旧唐书·经籍志序》引毋煚《古今书录序》。

⑰《旧唐书·经籍志序》。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